

# 徘徊歧路的西方经济学

胡 寄 窗

自七十年代初以来西方经济学一直处在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许多现存的理论和原则均无法运用来解释或处理客观实践中存在的经济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这并不是它所陷入的第一次困境。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后曾有过一段二十多年的开拓昌盛时期。自上世纪之初起就有斯密的苏格兰同乡劳德待尔、德国的亚当·缪勒和瑞士的西斯蒙第对《国富论》提出反对意见。接着在斯密的追随者内部也出现了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的争论以及马、李与法国萨伊的争论。此后数十年间，来自反对派的外部攻击和正统经济学内部的异议，迄未中断，但并未因此而使西方经济学停止其发展。相反地，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有人宣称要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象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精确的科学。这虽然是一种幻想，却使西方经济学转入一个较为精密的个体分析（即现代所谓微观分析）阶段。这一转变尽管曾受到许多外来的抨击和存在不少内部的歧见，正统的西方经济学毕竟仍保持着较长一段时期的支配地位。1929年的大恐慌，使已支配多年的个体分析陷入无法应付严重失业问题的困境，于是凯恩斯的整体分析模式应运而生。凯恩斯模式照样受到外来的和内部的经济学家们的指责，但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仍是它的黄金时代。那时凯恩斯主义者们都踌躇满志，笃信他们的理论能解决现实中的一切经济问题。在美国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智囊团中他们的建议常受到高度的重视。然而好景不

常，七十年代开始后，由于客观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经济学家们的悲观情绪逐渐滋长，对现存理论的信念发生动摇。早在1972年琼·罗宾逊就曾提出经济理论要来一个“第二次革命”；两年后希克斯刊行他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八十年代初又有人以《经济理论的危机》为书名刊行专著，要求来一个经济学的“第五次科学革命”；1986年美国《挑战》杂志曾发表一篇论文，提出“经济学能成为一门科学吗”的疑问；1991年第一期的权威经济理论刊物英国《经济杂志》，汇集各国不同学派经济学家的二十余篇论文，回忆既往并展望未来的西方经济理论，也普遍地流露出不同程度的不乐观情绪。刚过去的这二十年是西方经济学有史以来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

然而上述这些非议，大都是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总框架中指责其这些或那些理论原则不能解释现实经济矛盾的局部而表象的分析，从未揭示其产生困难的最根本的原因。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当前所面临的严重困境是由于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的客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西方经济学本身却存在着一个无法适应此巨大变化的固有缺陷。因此，以往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适用性和可行性的许多理论原则，才丧失其解释能力和指导意义。

世界经济形势究竟产生了什么巨大变化呢？七十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很发达或中等发达的国家，无论在社会、政治或经济等生活领域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是人

们在日常生活中已能体验到的事实。在经济生活领域其变化尤为突出。当然这些变化均非从七十年代才开始的，只是到七十年代及以后才越来越发挥其强劲的影响作用。在经济领域主要有以下几种导致变化的因素。

**首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展，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信息是社会生产的另一种重要资源，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卫星通讯、光导纤维、大规模集成电路和集成光路等的综合利用，使信息的传递瞬息万里，迈进一个新的信息时代。**由于信息资源是人类有价值的共同财富，可以无偿地充分利用和共享，这就使它的功能足以突破经济活动的国界而日益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偶尔出现的新信息，可能人为地或非人为地很快在世界其他各地激起有利的或不利的反应。信息的无局限地传播必然使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变得更为敏感和复杂，这在二次大战以前的各国是很少见的现象。

**其次是跨国公司的空前迅速发展。**在197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已达10767家，它们分设在各国的子公司已达82266家；其生产总量占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1976年）；到1982年其对外直接投资已达8000亿美元。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或所在国筹集资金，利用当地有效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并直接在当地市场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进行销售。这就决定着它们经营方式、组织管理、投资分布等均应从“全球战略”出发，少受甚至不受所在国的局限。由于它们的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移动，产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也可主动的在具备有利条件或不利条件的国家之间进行调节。因此，跨国公司的资本及其产品的所有权虽然仍由个别私人投资者所享有，但这些私人投资者绝不限于其所在国的公民，而是由许多其他国家的私人投资者所分别享有，而且这些财产所有权在国际间的自由转移还是很频繁的。所以，在跨国公司盛行的

条件下，一定国家对于其整个国民经济的调节职能势必随之缩小，而其经济运行体制也将趋于国际化。

**再次是经济发达国家的货币流通之国际化。**第二次大战前，一国的货币至少在理论上是不能在国外流通的，不仅纸币如此，金银硬币到国外亦须“脱下国家的外衣”而按其实际含金量的价值进行交换。二次大战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美元同黄金一样作为其他国家的共同准备基金，于是美元变成可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货币。六十年代又先后出现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到八十年代西德马克和日圆也挤进可在国际间流通的货币行列，至于英镑与法郎在约定国家集团中之流通更是早已存在的事实。主要货币之国际化必然伴随银行业之跨国设立。跨国银行之出现使一国的金融活动日趋复杂，一国的中央银行如不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配合行动就难以实现其设定的目的。同时，现代所谓货币的含意，除一国的本位币外，还包括银行及其他储蓄机构的活期定期存款和各种信用度较高的公私债券，其内含较以往广泛得多。另一方面，银行的职能也随着客观形势之复杂而趋于多元化，从原来以经营存贷为主的业务，转变为更着重于从事国内外资讯服务、投资信托、公司购并、证券经营等等业务，这也是跨国银行产生的主要原因。货币与银行之国际化又进一步地加强了各国的经济国际化的趋势。

**最后，近二十年来各经济发达国家大都出现一种“经济一体化”的倾向。它们组成集团、加强联系，在各个经济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国际调节，以推动其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技术合作的进展，提高投资水平并促进国内外贸易的发展。**这些由若干国家组成的地区性一体化集团之间虽然仍存在着相互间的矛盾，而对此类矛盾之处理常是采取集团间的协商方式以谋求解决。这就会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之发展。世界经济一

体化在金融市场方面的表现更为显明。借助于金融活动操作的电脑化,不少银行和投资公司正在开拓一种能同时在十几个国家以十几种货币进行交易的系统。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股票交易所已开始实行夜间交易并计划在2000年实行24小时的全天候交易。新加坡金融市场基于其时间和位置上的特点,上午与东京、香港等市场进行直接地联结交易,下午与伦敦市场进行交易,午夜又与纽约、加拿大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全天候的运转。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商品、资本和劳动力能自由地参加国际交流,也就给一国的大小型企业活动的国际化铺平道路,进入一个所谓“无国境时代”。经济一体化对个别国家的影响,不仅象前面已提及的那样渗透到生产和流通领域,还将延伸到分配和消费领域。因为一个国家既同意对其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国际调节,就得对它的国家预算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作相应调整;同时,人民群众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收支模式亦将受国际影响而产生变化。即使是一个超级大国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完全按本国的意愿去处理对外经济关系问题。

总之,世界经济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那种一个国家能封闭式的自己处理自己经济问题的老方式已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我们转过来看西方经济学本身的情况。西方经济学自它成为一门科学之日起就是以—个国家为其研究对象或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例如,被公认为代表经济科学的第一部名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既以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为主题,显然是以—个国家为其出发点。1803年法国萨伊把斯密的理论体系整理成正统经济学的第一部通俗教科书,采用法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e'conomie Politique)为其书名。从此以后,“政治经济学”就成为正统经济学家们的习用名称,既称“政治”的经济学必然以—个国家为其研究对象。到上世纪七

十年代不少英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政治”的这个形容词太复杂而笼统,为了使这门科学更精密化,主张抛弃此形容词,直接把英文“经济”(economy)—词改成象统计学(Statistics)、数学(Mathematics)等—样的词型——Economics,即现代常用的“经济学”名称。自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书问世后,“经济学”这个名称成为除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通用学科名称。但是,“政治”的这个形容词虽然被抛弃,而其内容仍然以—个国家的经济为其研究对象。现代西方经济学家—般均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同义语,能以替换使用,可为明证。1936年凯恩斯出版他的划时代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西方经济学家们到现在为止仍公认它是一种短期的和静态的分析,并是一种封闭式的分析。换言之,是假定以不存在对外贸易的封闭式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因此,西方经济学自其建立之日起—直到现在,它的一切理论原则,不论早期的或后来继续发展的,无不以—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形成。

由于自斯密以来的正统经济学家们—贯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方面高唱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实质上仍是从—个国家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国家的利益考虑出发的所谓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于是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的这个内在的特点,长期地未被人们所察觉。事实上,连那些创建或发展西方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们也只是出于—种顺应传统的下意识活动而继承此特点,不必是有意地要掩盖此特点的真象。如果我们将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原则分别仔细推敲—下,很容易就会发现它们大都是在以—个国家为范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为了更清楚地揭示西方经济学的这—内在特点,兹举以下—些理论原则为例证:

#### (—) 生产论领域的理论原则

(1) 财富概念 财富是西方经济学最

根本的并是最早提出的研究对象。不论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财富，亚当·斯密统称之为“国富”，这就给财富的研究划定了一个必须以国家为基础的框框。

(2) 生产概念 生产必须指财富的生产，财富既指一国的财富而言，则它的生产活动也将以一个国家为范围。当前经常提到的最重要的生产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等无不以一个国家为范围，到现在尚无“世界”生产总值新概念之出现。

(3) 生产三要素 土地系指一国的领地和资源。劳动力基于种种原因在国内各地间的自由移动也有困难，故在理论或实际上更不可能有国际间之自由移动。资本在理论上是不许可在国际间自由移动的，必要的资本输出和输入也须由国家严格控制。

(4) 供求定律 供求定律的应用以往专指一定商品在一定时间内的一定市场上的平衡运动而言。现代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也只限于一国之供求总量，不存在国际间总供给与总需求。与此定律有联系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均是微观分析，连宏观分析水平还达不到，更谈不到超越国界。

(5) 价值理论 古典经济学最有代表性的劳动价值论，其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必须在一定社会生产条件的假设下才能确定，而此假设的地理范围从未超过一个国家，故国际劳动价值是西方经济学从来不予考虑的理论。现代西方较流行的效用价格概念是以一个消费者在一定时点上的心理偏好为根据。各个消费者的不同偏好能否加总起来形成一种市场需求也是无法解决的老问题，更谈不上一个国家和全世界的需求问题。此外，所谓稀缺价值论如应用到一个大国已有困难，再应用到全世界，就毫无意义，因为一定资源此地稀缺彼地可能丰裕。

## (二) 交换论领域的理论原则

(1) 货币理论 交换论中最核心的理

论是货币。前面已经指出在二次大战前一国的货币只能在本国内行用。因此，西方经济学中有关货币的理论无不以此为基础而建立。例如，“法偿货币”是指国家法律认可流通的货币，当然要以国家为范围。又如货币的两个主要职能：一是交换媒介职能，它必须是能被普遍接受的货币才能行使此职能，此地所谓“普遍接受”也是以一国的人民之接受为其暗含的前提，绝不是在国外也能被普遍接受；第二是价值贮藏职能是以货币在未来也能被本国人民所接受为前提。

(2) 货币数量说 这是西方经济学中较为流行的货币价值理论，其主要内涵是货币量的变动将使币值作反向的变动，并使物价水平作正向的相应变动。这里所谓货币量，在不考虑非法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也是以国家直接或间接认可其流通的货币之数量。至于物价水平更须以一国及其所属地区为范围。

(3) 银行理论 早年的银行一般是由所在国家的政府或私人设立的机构，外国银行之进入一向是被禁止的。至于中央银行之创立，其主要功能就在于它能按照国家的意旨采取各种方式以调控本国的金融活动，其国家属性更为显明。中央银行用来调控金融的两种重要措施如调整贴现率和调整准备金率，均系对国内各公私银行间的活动并系以理顺本国的金融为标的。

(4) 国内外贸易理论 国内贸易以本国为范围是不言而喻的，无庸多赘。国际贸易从表象上看是国际间的商品流通必然超越国界。但如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仍是以获致本国的利益为核心。例如所谓国际收支的顺差与逆差，必须是从本国的角度考虑的。倘将贸易对手国也包括在内，则此国之顺差必然是彼国的逆差，反之亦然，根本不存在顺逆差这种理论概念。再就国际贸易的自由与保护两重要理论而言，保护贸易绝对不可能是保护外国的

贸易，而是不惜损人利己以谋求本国工商业的繁荣。自由贸易表面上是宣扬贸易国双方的互利，实质上，只有一些经济极为发达的国家才能采用此理论来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外贸收益而服务；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之所以不接受此理论，那是因此理论对它们的国家是有害的。因此，此两种理论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均须由对一国之是否有利来衡量。

### （三）分配论领域的理论原则

（1）国民收入 分配理论中首先要研究的一个最紧要的理论概念就是国民收入。既称“国民”的收入，那就只能是以一个国家为范围，无论是真实的或货币的国民收入，无论对它采取何种计算方式，均应以一国为范围，而且必须以一定年度为基础，故其国家属性是非常突出的。

（2）工资、地租、利息和利润理论 这些理论均系分配论必须研究的重要范畴，也是构成国民收入的基本因素，其国家属性也是很显明的。这些因素中的较有代表性的概念如工资水平、平均工资等从未超越国家界限；又如利率水平、平均利润率之计算亦应以一个国家为限，到现在尚未出现过国际利率或国际平均利润率等说法。

（3）收入再分配理论 一般是通过国家采取租税和补贴等方式来实现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再分配。一些私人慈善组织的措施所起的再分配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此外，如反映不同收入家庭组合的收入不平等情况的洛伦兹曲线及其有关的基尼系数，也是一定国家的统计资料所发展出来的原则。又如已过时的工资铁则和工资基金说等旧理论更须以一定社会和国家为范围。

### （四）消费理论领域的理论原则

（1）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是体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成果和最终目标的重要概念。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消费水平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须从生产的实际水平出发使自然资源之利用既能适应当前的需要又能

造福于后代；二是须同时照顾到当前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之满足。换言之，必须从一国的国情出发，舍此就谈不到消费水平之是否合理。

（2）消费指数 不论是消费品物价指数或生活费指数，也不论采用何种方法来编制这些指数，均不外是以一定基期和报告期的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品的两种价格总额之变动所计算出来的相对数，因此必须以一个国家为范围。

（3）贫困线概念 贫困线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收入和消费理论中经常提到的概念。但怎样才算“贫困”是个含混的相对概念。例如以印度与美国相对比，印度很贫困而美国是很富裕的，但很富裕的美国仍存在着很严重的贫困问题，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也不能以一种绝对贫困标准来衡量。因此，所谓贫困线只能是指一定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某种低生活费用水平，绝不会有国际共同的贫困线。

这里附带指出一些问题。当前风靡一时的所谓“宏观分析”，绝不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的“宏观”原意。其标准涵义系以全社会或整个国家为研究范围，到现在还没有学者把它运用于超国界分析，这正好是继承并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又如当前流行的经济成长理论在计算其成长率时也是以一个国家为单位；比较经济制度只是各国经济情势的对比分析；由此类推，其他经济分支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以及其他等等无不以一个国家为基础进行阐述。

仅从以上的少数例证已足以充分表明西方经济学的国家属性是十分牢固的。

既然七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形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原则仍保持其以一个国家为基础的内在特点，则此类理论原则陷入无法解释或指导客观经济现实之困境，是势所必然的。这里再

用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如，传统的货币理论力求对一国货币价值保持稳定。某国的货币一旦因意外事故之影响而贬值，其国家定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促使其回升。但近几年来美元曾不止一次的大幅度贬值，美国历届政府居然袖手不管，西德和日本政府反而向市场抛售大量马克和日圆以收购美元，促使其恢复原来的币值。当然德、日政府的这种行动是为了使它们各自的美元资产不致受贬值的损失。但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大战以前是不可能存在的反常现象，也表明理论与实际的脱节。

又如传统的利率理论，认定提高利率可以抑制通货膨胀，降低利率可以刺激投资、繁荣经济。到现在，以美国为例，如它提高利率，则国外大量美元会涌进美国反而加剧其通货膨胀；如它降低利率，则大量资金因无利可图而流向国外，反而造成其经济的不景气。这并不是利率理论本身的错误，而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致使利率理论不仅不能发生期望的作用，甚至发生相反的作用。

再如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认为排除进口商品的竞争，既可使本国的幼稚工业得以成长，也使已有一定基础工业保持稳定发展，并可维持甚至提高国内就业水平。现在，日本和南朝鲜的汽车大量输入美国，对美国的汽车工业及其工人的就业均产生很不利的影响。根据传统保护理论，美国只须大幅度提高日、朝汽车的进口关税或严格限制其进口限额，即可解决问题。但目前的美国基于对政治及其他因素之考虑，不能采取这种果断的措施，只好运用劝说方式来说服日、朝，以致此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撇开其他因素，仅从经济方面考虑，也说明即使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亦不可能单纯从本国利益出发来处理国际经济问题，从而使传统的有效理论原则丧失其可行性。

在导致世界经济形势产生巨大变化的诸因素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世界信息网与交

通网的形成和飞速发展这两个因素。它们使世界上以往相对孤立的许多国家变成好象是“鸡犬之声相闻”的一些邻近地区。任何地区一旦发生什么事故，不论好事和坏事，很快的就会波及其邻近地区，甚至还酿成世界性的巨大变动。在坏的影响方面，例如阿拉伯石油输出组织的几个主要成员国，在六十年代以前尚是些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贫弱落后小国家。它们在收回本国石油生产自主权后，结合成石油输出组织，接着在1973年起的一年多中极不明智地将石油价格暴涨几倍，造成全世界各石油进口国的很大经济震动。几个不引人注意的小国家的轻举妄动，便在世界各国激起如此重大的影响。这在二次大战前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事情。又如1987年的“黑星期一”，纽约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暴跌，立即引起世界各重要证券市场之股价随之暴跌，使无数证券投机者蒙受严重损失。据说此次纽约证券价格的暴跌系由于计算机的失误所造成，不论此说法是否可靠，至少证明一个地区的偶然失误就可能波及全世界。与此事件有关的另一问题是：按照传统理论和历史经验，证券价格之暴跌必然伴随一场经济危机，1929年发生的大恐慌可为例证。但“黑星期一”的股价跌落幅度虽不下于1929年的跌落幅度，而受损失者仅为各地的证券投机家，全世界工商业只是受到一场虚惊并无实际影响。这又说明当今的情况与以往已大异其趣。

另一方面，信息网与交通网的飞速发展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如高精尖生产技术的秘密、企业科学管理的诀窍及其他等等，在信息与交通工具的迅速传递下已不再象以往那样由发达国家的一些大企业所独占，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即时吸收、模仿和消化而为本国经济服务。这样就使得某些发展中国家能在一、二十年中走完发达国家以往需要数十年方能实现的经济成长进程。同时，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在现代电脑的运用下已突破

传统的地区市场之局限，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享其利。但是，给一国经济带来扩展的有利动力，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对原来固有的经济模式的破坏。因此，无论是不利的或有利的国际影响均将成为一种外生的冲击力，迫使现存的经济运行体制产生不同程度的动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前进，这种动荡的频率将愈来愈增高，从而使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原则愈来愈不合时宜。

由上可知，**西方经济学如不来一个根本性改造，抛弃传统的从一个封闭式国家出发的理论，另建一套能适应更为开放型的国家的动、静态经济理论，即不可能具有适用性与可行性。**当然，这是个极为艰巨的任务。首先，尽管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颇为强劲，而保持一国利益的信念仍是一种极为牢固的传统势力，非短期内所能破除。在无国家的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出现以前，超国家的西方世界经济学是无从建成的。假设真能实现一个以全球为范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那时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反而更能发挥其理论指导意义。可惜这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空想。因此，西方经济学将在未来极长远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处于一种既无法适应客观现实又不能从事根本改造的尴尬局面。

与西方经济学的内在特点有关联的另一个重要缺陷是尚未建立起一套令人满意的动态分析理论。“动态”概念早在上世纪末已

由美国J. B. 克拉克提出，但未引起广泛注意，直到二次大战后才有日益增多的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动态经济分析理论之研究。然而他们花费了半个世纪的努力仍未能建立起一套象静态经济分析那样的理论体系，事实上仍停留在比较静态分析的水平。现代国内外频繁出现的冲击给各种经济事物造成的频繁变动，使动态分析理论之需要更加迫切。没有动态理论就不可能解释和指导动态的客观现实。这也是以静态分析为主的西方经济理论难于充分适应现实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理论体系的这一内在的特点或缺陷，似乎尚无较清晰而全面的认识。但他们无可逃避地须经常面临这一缺陷所带来难题。到目前为止，他们处理此类难题的常用方式，不外对所遇到的个别具体难题，有的对相应的现存理论予以局部的或全局的否定，有的则为之进行某种辩护，也有的对它的某些部分有所发展使它勉强适应现实，其结果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也许可能对西方经济学有某些小改进。如根本缺陷未能克服，这些改进均是无关宏旨的。但要来一个根本改造更是困难重重，如果还不是不可能的话。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西方经济学将在未来的一段漫长岁月中仍处在一个徘徊歧路的境地。**

(责任编辑 曾德国)

## 一次重大突破

香港《经济导报》1992年第12期登载章怡文章“台湾经济会议与大陆全面经济合作”。文章报导，台湾在三月七日、九日举行了经济会议，“两岸经贸”问题是会议的一个焦点。与会的企业界人士及学者、专家表示，“政府”应全盘规划扩大两岸交流，加紧与整个大陆的经济合作，并批评了当局步伐保守。鉴于区域经济整合已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台湾经济会议经贸组作出了一项突破性的建议，要求放弃原先仅局限于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行性建议，全盘规划及推动与整个大陆的合作，进而落实“中华经济合作”构想。这项建议取得会议共识，并获得“行政院陆委会”主任黄昆辉的认同。

(余佑清)